

以史切要：重构建国的历史解释

——《清建国别记》考论

陈斌

【摘要】《清建国别记》是对清朝开国史的历史考证，章太炎于世系渊源、历史方域、人物事迹三个维度详述有清建国历史。《清建国别记》所述论题，揭示了关于清建国的历史解释之争。历史解释的分歧，首先体现为明史与清史之争。此外，宋金旧事的历史比附，也影响了不同的历史解释方案，而究其根本，则是关于建国正统观的叙述策略差异。结合晚年论述与民初时局来看，章太炎的清史研究具有史学和史论双重意义。就史学而论，它基于实证性、批判性笔法重建政治史书写方式，在学术思想史上创立了章太炎版的“新史学”。就史论而言，《清建国别记》所做的历史解释，蕴含以史切要的立意，呈现的是有关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思：以历史维系国性，后者正是章太炎国家观的立国根基。

【关键词】《清建国别记》 章太炎 国家观国性 新史学

《清建国别记》是章太炎晚年的精要之作。在与弟子论满洲旧事的信函中，太炎自述：“年来著述颇稀，唯《三体石经考》《清建国别记》，自觉精当。”^①临终之时，太炎曾嘱咐后人：“余所自著书，《章氏丛书》连史、官堆各一部，《续丛书》凡十余部，《清建国别记》亦尚存三四部，宜葆藏之勿失。”^②由是可知，章太炎对此书极为珍视。然而，综观已有研究，确如《清建国别记》的整理者所言：“由于这部作品流传不广，并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③王汎森教授即曾坦言：“关于清建国实况，章太炎于民国十三年作《清建国别记》一书，此书流传极稀，遍寻未获，不得寓目，故本节主要依据近人袁英光的考述写成。”^④汪荣祖先生也曾写道：“不知何故，这本书问世以来，似乎没有引起现代学者太多的注意。”^⑤在他看来，“章太炎写清朝开国前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学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⑥上述研究者对《清建国别记》的讨论，确有助于后学窥其要略。然而，就深度而言，既有研究多停留于文本介绍层面。^⑦随着《清建国别记》的整理重刊，与此相关的研究理应加以深化。

《清建国别记》是对清朝开国史的历史考证。以“别记”为题也就表明章太炎对清建国的分析不同于已有的历史论述。太炎曾在书中自叙：“清上世之事，以无书契，子孙弗能志，虽世系亦慢也。努儿哈赤起侧微，史官载之，其辞多不诚。余昔因攘胡事，欲知其究竟，导端《明史》，固不能具体。”^⑧由此可知，撰写《清建国别记》是章太炎酝酿已久的写作计划。晚清之际，太炎因力主革命而欲作此文，自在情理之中。民国创建之后，太炎为何坚持搜集史料撰写此文，则值得深思，毕竟如其自述：“书之成，距余有志攘胡时已远矣。胜国遗俘于今无所复恨。”^⑨这就意味着，在介绍《清建国别记》的篇章内容之外，研究者至少仍需思考：在 20 世纪 20 年代，章太炎为何执着于撰写清朝开国史？在文本背后，太炎有什么样的历史关切？基于太炎的历史观，《清建国别记》的意义何在？

事实上，国族政制跌宕之际，史论即为政论。太炎站在民国路口回顾清朝开疆史，既为历史考证，也是历史解释。其中之意旨，不仅在于梳理政治群体的历史模式，还在于借此思考政治共同体构建的规范原理。基于上述认知，本文将首先概述《清建国别记》的核心内容，进而超越文本，论述关于清建国的历史解释之争，最终在史学与史论双重维度上，揭示章太炎之清史研究的史学意义和以史切要的政治立意。

一、《清建国别记》文本要略

《清建国别记》凡十一篇，包括《清为金裔考》《建州方域考》《范察、董山、李满住事状》等重要章节。限于文字差异、史料存留、史观分歧等多种因素，明清更替史向来繁杂难考。例如，孟森在民初讲述清史时曾言：“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⁸⁾在此背景之下，梳理清朝开国史确非易事。为详实考辨，章太炎写作《清建国别记》时，曾参酌文献约五十篇，其中很多是明史旧本。吴承仕就曾帮助章太炎誊抄宪宗、英宗等旧本实录，而太炎也曾亲自搜集《明会典》《程篁墩文集》等旧史旧著。

从国家构建的法理视角来看，作为“辛亥三杰”之一的章太炎，无疑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其论著着眼之处，正在于“以历史立国”。⁽⁹⁾在太炎的著作中，不乏关于国家论的阐释，《中华民国解》《国家论》便是典型代表。置此脉络之中，《清建国别记》同样延续了以国家为题的论述主旨。在此书中，章太炎于世系渊源、历史方域、人物事迹三个维度详述有清建国历史。

（一）世系渊源

综观章太炎所持历史观，语言、风俗、世系、典章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以历史定中国，既是一种认识论，同时也作为方法论，贯穿于太炎的著述之中。章太炎注重梳理共同体的世系渊源，在《清建国别记》的开篇，太炎就详细论证清为金之后裔。

在《清建国别记》出版之前，关于有清开国的世系渊源，史书存有不同的历史记载。正如泰勒所言，当新的集体主体建立自己的国家时，需要以新的方式去讲述它的故事。⁽¹⁰⁾例如，据《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天女吞朱果而有身，生一男，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以定乱国。⁽¹¹⁾民国初年，赵尔巽主持编修《清史稿》时亦循旧说。很显然，此说神话色彩浓厚，不足为信。正所谓破而后立，章太炎从三个方面着手梳理清室先祖世系。

第一，阅天聪年间旧史。

太炎阅览《清太宗实录》等旧史，获悉天聪年间太宗自称金后的三则史料。首先，天聪三年，太宗曾告知房山生员：“闻尔房山县人，曾奉祀我前金皇帝，是亦有劳之民也。”⁽¹²⁾其次，在清内阁所藏天聪四年《入犯京师誓众谕》中，太宗同样自称金国汗。再次，天聪七年，太宗与朝鲜王的书信也曾记述：“瓦尔喀与我，俱女真国大金之后。”⁽¹³⁾由是可知，清先祖多次自认是金之后裔。

第二，考究陵碑深意。

章太炎从《清世祖实录》中获知，顺治十四年六月，清室曾立金太祖世宗陵碑，而碑文则称金有功德于天下。章太炎认为，碑文之所以尊金朝以先德，正是因为金是清之先祖。清入关之后，宋金旧事依然是华夏故土难以忘却的历史创伤，因而碑文不予记述世系传承。

第三，详考明著旧刊。

除了阅览清实录等官方记述，章太炎也多方详考明人所著史册。例如，太炎曾从上海王植善处获得两本明著，分别是王在晋的《三朝辽东实录》和茅瑞征的《东夷考略》。据此二书所载朝鲜咨文，太祖曾自称为后金国汗。虽然清后世对此讳言，但金与后金的渊源，确有史书可见。

以上述论据为基础，章太炎确证清为金之后裔。以今日视角来看，此论似为常识，不足为奇。然而，读者须知的是，民初时期，清朝前史仍然隐秘，做此分析实属不易。清开国世系并非仅是一朝家室谱系，更关乎清得天下的历史正当性，而后者又将影响清朝国家整合与治理的实效性。正因如此，清代史书多讳言有清上承于金，这就增加了历史考证的难度。就此而论，章太炎所做历史分析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清史学者谢国桢先生就曾认为，《清建国别记》于清初史事多所创获。⁽¹³⁾

(二) 历史方域

通过阅读明人陈仁锡所著《潜确类书》，章太炎获知建州女真即为清之祖先。如果说《清为金裔考》确定的是清室族裔基础，那么随后需要思考的则是其时间起始与空间版图。如论者所言：“一切表象只有在时间与空间的舞台上才能登场亮相。”⁽¹⁴⁾章太炎对建州方域的考察，兼具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

首先，在时间维度上，建州在汉时就属玄菟郡所治。《清一统志》曾记载，建州卫也即兴京故地有高句骊城。章太炎认为，在汉代，高句骊城就是高句骊县，为玄菟郡治地。章太炎考阅《魏志》得知，高句骊国都城曰丸都，即民国时期辑安所在地。上述地域均在长白山以西，明时为建州女真集中之地。此外，章太炎据《使职文献通编》得知，明永乐元年设建州等卫之后，各地女真酋长“悉境来附”，有所征调，无敢违期。

其次，在空间维度上，明时建州方域大抵在辽东东南，地势衡长，南以鸭绿江为界。清初称赫图阿剌，后称为兴京。章太炎阅览明人旧书后认为，赫图阿剌就是清祖居之地，其地位于长白山以西而不及长白山。太炎由此推断，《太祖高皇帝实录》有所不实。原因在于，按此书记载，布库里雍顺不仅由天女所生，而且素居长白山以东。

总体来说，章太炎对建州方域的历史梳理是较为详实的，在繁琐的历史考据背后，也隐含两层论史要点：(1)清上世所居建州方域，本是明朝属地。自永乐元年始，明朝对于建州就享有稳固的管辖权。这是一种历史性权力，正是历史时间赋予管辖权以正当性。(2)清之开国始于窥边，它并非如实录所言乃“天授治乱”，而是始于对明治的反叛。虽然章太炎自述于清无所复恨，但在论及建州时依然言辞激烈：“是以终明之世，建州颇为寇盗。”⁽¹⁵⁾如此一来，太炎也就实现了对清史所述神话的祛魅。章氏尝言：“欲知中华民国之疆域，东西南北究以何为界，便非读史不可。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¹⁶⁾非熟知而不可。太炎的此番研究，不仅对于梳理清开国前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稍后日本在国联所提的“东三省本是满洲之地”论，也可形成有力回击。

(三) 人物事迹

在《清建国别记》中，考证难度最大的，莫过于梳理清室先祖人物谱系及其历史事迹。清室世系向来难考，因难以定夺，史家孟森在撰述《清史讲义》时，曾分述“合各纪载所详之清世系”和“《清实录》所详之世系”。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如何确立二世至四世的先祖谱系，前者以范察为二世、童挥厚为三世、猛哥(可)帖木儿为四世，而后者于二世、三世皆不详，并以孟特穆为四世。⁽¹⁷⁾具体来说，难题在于如何确定范察、猛哥帖木儿、李满住、董山等人的渊源关系。章太炎阅览史料后发现，“明史稿及后定明史于朝鲜传略载童仓事，于范察、董山则讳之”，⁽¹⁸⁾明人黄道周所著《博物典汇》对此有详细记录，但清官书《开国方略》引黄书时却隐其姓氏。

经参阅明著明刊，章太炎对清先祖谱系做了详细梳理(参见图1)。据其考证，明洪武时即设建州卫，由阿哈出领之，后传其嫡孙李满住。永乐十年设建州左卫，猛可帖木儿、范察同处左卫。猛可帖木儿被杀后，其弟范察与其子童仓逃至朝鲜，而由童仓之弟董山袭建州卫指挥。待范察归来，则于正统七年设建州右卫。自此，董山与范察分领建州左右卫，范察堂兄李满住领本卫。成化三年，建州叛乱，明军诛李满住，禽董山及时任右卫都督纳郎哈(范察之孙)。随后，董山之子脱罗承袭先职，纳郎哈无子而以其叔卜哈秃袭职，卜哈秃终世再传肇祖、兴祖。除了分述清先世谱系外，章太炎还详考人物事状，例如，李成梁诱兵征王杲时，觉昌安、塔克世有功而死，努儿哈赤于明，一任权谲，非徒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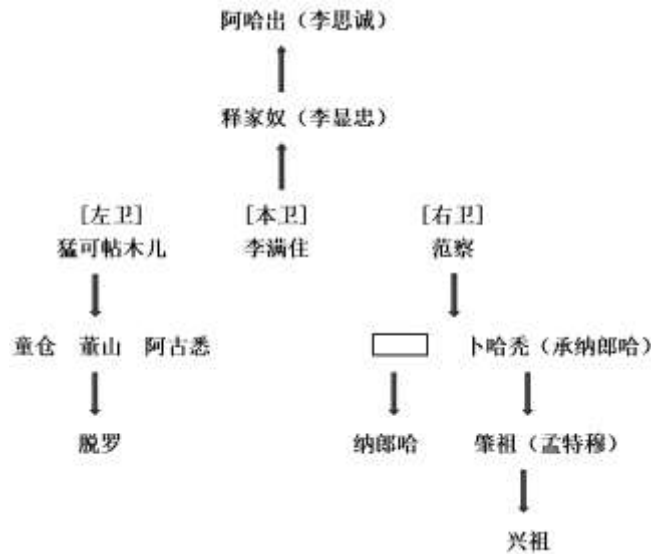


图 1:《清建国别记》所考清室先祖谱系

至此，章太炎完成了对清先祖谱系的历史考证。史家金毓黻曾言：“纪载建州女直事，最详最确者，首推《明实录》，次则《朝鲜实录》。就此二书取材，参以诸家记载，真相得以了然。”⁽¹⁹⁾章氏所取史料，大体在此范围之内。他曾悉心搜寻史料且多方对堪，对于关键的历史事实，还以“事状后考”的方式补充论证。在全书付梓之际，章太炎仍坚持史实为要的原则，对所作文本保持开放性。1924年10月23日，章太炎曾再次致信吴承仕：“仆前作《清建国别记》，承足下为检《明实录》，而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未检阅，明人记载此三朝建州事绝少。然其承袭爵位，《实录》仍当有文。因缺此未检，于彼世系，终有怀疑。近如得暇，请将此三朝《实录》从头至尾一检，其有建州事状者，悉为录示。倘《清建国别记》中或未谘，仍当改定也。”⁽²⁰⁾深入分析文本可知，太炎所做考证确有不足之处，兹择要简述两点。

第一，对满洲来源的推论过于武断。章太炎曾作此设问：清室上承女真，而其部落为建州，自金至明，并无满洲之称，为何此后清官书将金国汗称为满洲皇帝？对此，章氏试图从清时著作中探寻答案。他结合《满洲源流考》的相关记载推断，满洲之名源于西藏丹书，后者每岁所献丹书都尊言“曼殊师利大皇帝”，此乃吉祥之意。据此，章太炎认为清室自视为“满洲”，系对“曼殊”之误用。从论史角度来看，太炎此说几为推定，缺乏论证，也无其他史料辅证。当然，满洲的起源问题，素为清史难题。⁽²¹⁾在新近的清史研究中，有研究者考诸满文旧档认为，满洲(manju)乃部落名称，并非国号，但满洲部落兴起之后，“满洲”又别作国号使用，习以为常。⁽²²⁾较之太炎所论，此说似更得当。第二，以音韵之法考究人物谱系偶有不足。章太炎有扎实的音韵学功底，此自无须多言。然而，在梳理清室人物谱系时，就方法而言，太炎也对音韵方法形成了路径依赖。例如，唐邦治所作《清室四谱》认为，肇祖孟特穆即为猛哥帖木儿。太炎则坚持认为，孟特穆是猛哥帖木儿的孙辈，“猛可帖木儿之子为童仓、董山，孟特穆之子为充善、褚宴，董山可说为充善，童仓又何说邪？”⁽²³⁾太炎从对音的角度考察后认为，童仓与褚宴并不相会。事实上，以音韵为依据考辨人物谱系，在涉及满文和古汉语对译时，多有受限之处。从整体来看，此后的清史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孟特穆与猛哥帖木儿为同一人。⁽²⁴⁾

二、清建国的历史解释之争

《清建国别记》对清室渊源的考证，呈现的仅是史实面向。在此背后，章太炎着意之处，更在于对清建国的历史解释，它是一套有别于清代官书的历史言说。孔飞力先生曾有宏论：“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²⁵⁾于太炎而言，华夏立国根基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其史论与政论的核心意旨，无不呈现为“建国—立国”之思。政权

鼎革、政体变换虽是面向未来的政制规划，但这种建构活动也总会背负历史包袱。也就是说，当下和未来有时需要交由过去加以评判。因此，在政权初创时刻，对建国历史根基的解释与回应尤为必要。从历史视角来看，建国的主体、方式等若与历史传统迥然有别，则会打破历史连续性，而连续性的断裂将使人们拥有从属于“两个时代”的意识。⁽²⁶⁾围绕清建国的历史解释之争，正是典型的例证。

清建国之前，建州女真逐渐由一种族裔类别成长为族裔共同体。族裔共同体不仅是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类别，而且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观念秩序，它至少包括六项特质：集体性的适当名称、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与众不同的文化要素、与具体“祖地”的联系、在人口主要组成部分间存在团结感。⁽²⁷⁾自范察、董山起，以至清太祖建立后金，清先世逐渐构建了相对成熟的族裔共同体。这一过程既奠定了清开国的历史根基，又在特定情境下构成清建国的历史包袱。历史根基之所以成为包袱，是因为新兴国家的建立可能会遭遇其他族群的古老历史传统，当两种以上历史传统“短兵相接”时，若处置不当，则前者所推动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受到负面评价。历史事件虽是客观发生的，但历史意义并非直截了当地呈现的，而是需要通过话语转换加以建构的。关于新兴国家建国根基的叙述，不同的解释者往往采取不同的解释方略，“它们时常在有关民族或民族国家发展及特征的不同理解上，形成相异的竞争性观点。”⁽²⁸⁾也就是说，关于建国的历史解释，总是处于竞争之中，并且不断变化。

就清建国历史而言，官史与私史记述有别，明史与清史多有不同。即便是清代官史，不同时期的记载也偶有差异。例如，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儿哈赤建立大金汗国，改元天命，绍述金源而脱离明朝。天聪年间，太宗虽多次自认为金后，但也曾讳言金裔。及至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清太宗皇太极则下诏以满洲取代诸申，一切人等止称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诸申)，⁽²⁹⁾并于次年四月十一日立大清为国号，径以满洲作全域之称。至于上述历史解释转变的原因，萧一山采取了实力论的解释：最初为征伐由明兵保护的叶赫，建州需以攻明为先，故自立金国，此后实力渐长并有属邦，乃以大清为号，俨然与明朝为敌体，不再说是“看边进贡，忠顺已久”的“属夷”了。⁽³⁰⁾这种实力论的解释具有两点不足。首先，在征服朝鲜、降服察哈尔蒙古后多年，清太宗依然时而称金后，时而讳言金后。也就是说，清室的解释是策略性的，不能单以实力而论。其次，乾隆四十二年所定《满洲源流考》，仍执着于为清室建号满洲以及易代更迭辩言。由此可知，清室关于建国历史解释的变化另有深意，而非仅因实力变动所做顺势调整。

事实上，有关清建国历史解释的争论，关乎立国根基这一宏观要旨。对清建国历史的解释，深处传统中国史论末端，它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承载深重的历史记忆，夷夏之辨、正统之争等问题在此一并呈现，加剧了历史解释的复杂性。总之，清建国并不仅是清代一朝之事，研究者应延长历史视线，在传统中国的史论脉络中，理解关于清建国的历史解释之争。具体来说，需要参酌三组历史背景。

第一，明史和清史之争。

对于清代开疆建国，清史书其大端，而明史也多有详述。明清更迭，并非瞬间完成，而是存在时空交叉。就清建国史而言，明史与清史记述具有显著差异。例如，明史叙述多认为，清建国之前，满洲“早沾政化，元明授以爵禄”，⁽³¹⁾而清代官书于此自然是另一种叙述。因此，明史于范察等叛事有详细记载，明人著述如《博物典汇》《东夷考略》《使职文献通编》等对此也有详述，而清实录对此几乎不提。明史延续传统的书写方式，视建州为管辖之地，很自然地对清室崛起采取“寇边一叛乱”的解释立场。为了占取对历史的解释，清官史的叙述策略也愈趋成熟。首先，自述先世上承天德，以神话记述其历史渊源。其次，对于关键的历史事件从略书写，如对与明的附属关系多有讳言。整体而言，明史书写大体基于静止的、累积的历史观，视明治具有天然正当性，而清代官史书写则以动态的历史观为基础，以便为朝代更迭张本。乾隆上谕曾言：“汉高乃秦之亭长，唐祖乃隋之列公，宋为周之近臣，明为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复顾惜名义。”⁽³²⁾明史与清史所做历史解释的差异，是章太炎写作《清建国别记》的宏观背景。当然，《清建国别记》本身也构成历史解释之争的重要一环。

第二，宋金旧事的历史比附。

谢国桢先生曾言：“清初史事，至乾隆以后恶其不文，颇多避讳。”⁽³³⁾事实上，有关清史之讳并不始自乾隆。如前所述，天聪三年，太宗文中可见“我前金皇帝”等称，而考满文老档，晚至崇德元年初，清祖与明通信时也曾多次自称金国汗。⁽³⁴⁾然而，天聪五年，清太宗出兵锦州时却对祖大寿说：“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³⁵⁾清官史取满洲为建号，而不以金为先世，是比较成熟的书写策略。如所周知，宋金旧事是传统中国史论中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揆诸历史，特殊的中原一边疆关系形态，使得“中国”意识在宋代凸显，当时的精英观念和经典思想总是在试图证明“中国(宋王国)”的正统性。⁽³⁶⁾后世史论多将宋代“历史符号化”，视有宋之亡为政统断裂。及至清室兴起，虽时过境迁，但以明比宋、以金视清的历史记忆却经久不息。1933年10月10日，章太炎依然援引王夫之的论断：“一朝之变革不足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³⁷⁾置此背景之中，清太宗试图阻断对宋金的联想记忆，自有其深层考虑，而这一举措也隔断了清建国历史解释的“金—清”叙事。

第三，建国正统观的叙述策略。

宋金旧事的历史比附，初步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对清建国历史解释的不同叙述，与关于建国正统的叙述策略具有内在关联。在这一问题意识之下，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叙述策略。清修官书旨在确立清“得天下为正”的历史叙事。为此，除了对清世的隐微书写外，官书还重构了开国之因。如论者所言：“欲论清朝得天下之正，首先碰到的问题即明清嬗代。”⁽³⁸⁾针对得天下之因，清室悉心构建了官史叙述方案。例如，乾隆四十二年所布上谕指出：“若我朝乃明与国，当闯贼扰乱，明社既移之后，吴三桂迎迓王师入关，为之报仇杀贼，然后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统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³⁹⁾按清官史所述，清之鼎革是为明人相邀，并以威力定鼎中原，由此赋予了清建国的历史正当性。此前臣属于明的历史事实，均被这一历史时刻格式化。与清官书的叙述相反，历史的观察者如章太炎，则以传统中国的正统论为基点，否定这一历史正当性。《清建国别记》正是以清建国正统论为隐匿的对话者，反思性地解释清建国的历史本源。借助“建国—立国”的历时性国家观可知，在章太炎看来，清室虽完成了形式因意义上的国家建构，但在动力因层面却缺乏正当性进而无以立国。

综上所述，《清建国别记》所述论题，揭示了关于清建国的历史解释之争。“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并随着自身的变迁而将之重写。过去绝对不会固定下来，除非不再有未来。”⁽⁴⁰⁾历史解释者总是根据特定的价值判断重述过去，而在重述的过程中，时常引入不同的叙述原则。对清建国历史的观察与解释，不能就清而论清，而必须深入分析历史解释背后的价值判断。总而言之，关于清建国历史解释的分歧，首先体现为明史与清史之争。此外，宋金旧事的历史比附，也影响了不同的历史解释方案，而究其根本，则是关于建国正统观的叙述策略差异。

三、史学与史论：章太炎之清史研究的双重意义

围绕清建国的历史解释之争已经表明，历史不是历史事件的无序串联，史家所做意义阐释，同样是建构历史的重要环节。与此同理，《清建国别记》并非纯粹的历史考证之作，而是蕴含了作者的史论之见。钱穆先生曾如此评价章太炎的史学研究：“论史亦每与世事相发，而论政俗尤深切。”⁽⁴¹⁾这一论断，可谓中肯。《清建国别记》既有史实考证，也有史论宏旨。例如，夷夏之辨仍旧展现其间。如所周知，民国创建之后，“夷夏之辨”已为历史陈调。如此一来，值得思考的是：对民国十三年章太炎而言，“胜国遗孽于今无所复恨”，此时再作《清建国别记》重述此论，究竟有何深意？事实上，结合章太炎晚年论述与民初时局来看，《清建国别记》并非对历史言说的重复叙述，更不是太炎晚年“渐入颓唐”后日趋守旧的思想结果，而是蕴含时代问题意识，并由此具有史学和史论双重意义。就史学而论，章太炎的清史研究基于实证性、批判性笔法重建政治史书写方式，在学术思想史上创立了章太炎版的“新史学”；就史论而言，《清建国别记》旨在以历史维系国性，后者正是章太炎国家观的立国根基。

(一)重建政治史书写方式

章太炎对史学书写多有思考，在1902年致梁启超的信中曾言：“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

由详细调查。”⁽⁴²⁾在他看来，历史书写不可专列事状，而应有史有论，既阐释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启导未来。此时，因时局所需，章太炎的精力集中于撰写政论篇章，民国之后，方扎实推进历史研究，《清建国别记》便是典型代表。置于史学史中可知，此书有别于以往的书写方式。

第一，就文本而言，《清建国别记》以政治史为底色。

此处所言的政治史，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历史书写，后者除聚焦于帝王谱系外，主要陈述赋税、法律、军政、社党、外交等条。⁽⁴³⁾与此相比，新政治史书写的特点在于，通过对传统政制的问题化提炼，揭示政治共同体的根基及其演进，最终以特定历史观为基础，形成关于政治共同体应当如何构建的规范性判断。换言之，这种政治史书写方式，并不止步于对政治现象的历史描述，而是旨在借历史解释呈现特定政治理念。《清建国别记》对满洲旧事的梳理，不同于传统史记的编年、纪传体裁。此书所思宏旨在于，通过反思清建国的历史正当性，从侧面思考延续华夏文明的共和政体应当如何建立。

第二，就方法而言，《清建国别记》以实证史学为基本取向。

成熟的历史书写蕴含特定的历史意识，具体来说，它至少包含三个要素：第一，古今之别的时序意识；第二，证据意识；第三，对因果关系的兴趣。⁽⁴⁴⁾所谓证据意识，即不再对历史材料采取不辨是非的态度，而是基于实证考察的方法，审慎对待历史材料。《清建国别记》以明著明刊为基本史料，不采清实录所述创世神话，而是通过辨明史料的可信度，对满洲旧事详加考证，这种进路已呈现出显著的现代史学色彩。正如研究者所言，“章太炎的事状体，取材多是未经清人删削的史料，较为可信，其叙事也有自己的取舍尺度，蕴含他的历史判断。这种记叙方式改良了纪事本末体，是他的创建和贡献。”⁽⁴⁵⁾

第三，就理念而言，《清建国别记》是批判性的历史写作。

“历史不只是单纯地依靠记忆，正如一些人所知道的那样，历史首先是依靠批判的理解。”⁽⁴⁶⁾史家兰克的论断，在章太炎的史论作品中也有体现。《清建国别记》是对清建国历史根基的批判性解释，通过这一批判反思，章太炎由历史书写者转变为历史解释者。在此，清建国正当性的缺失，与华夏文明的主体叙事形成鲜明对比。对章太炎而言，《清建国别记》并不仅是对过往历史事实的重构，而且再次确证了民国这一共和时刻的正当性。

20 世纪初的中国有一场“史学革命”。梁启超曾如此概括传统史学弊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⁴⁷⁾针对上述问题，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理念对后世多有影响。事实上，章太炎也曾提出新史学撰述设想。正所谓创“新”须先弃“旧”，若对旧史学的认知不同，则对新史学的构想思路也会有所差异。章太炎与梁启超对旧史的认识就不无分歧。例如，梁启超认为二十四史仅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然而，在章太炎看来，《春秋》《史记》《汉书》，学术、文章、风俗、政治，都可考见，又岂是家谱？⁽⁴⁸⁾对于梁氏欲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为体例标榜科学化的新史学设想，章太炎曾多加批评。这就意味着，章太炎否定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构想。相较而言，章太炎对传统史学有更深的“同情理解”。当然，对其不足之处，章氏也有自己的判断。1924 年，章太炎在演讲中指出，当时史学“有取文捨事，详上古而略近代，详域外而略于内政，详文化而略于政治，以及疑古太甚之五弊”。⁽⁴⁹⁾对此弊端的拨正，正是章氏撰写新史学的理论追求。章氏做此演讲时，恰逢《清建国别记》初步完成之际。此书取晚近之事，注重事理而非辞藻，并详述“内政”与政治，正是太炎克服旧史书写弊端的尝试。就此而言，《清建国别记》以其实证的、批判的政治史书写方式，构成了新的史学范例，可将之称为章太炎版的“新史学”。从学术史角度来看，章太炎的“新史学”也自有渊源。

首先，六经皆史、以史切要始终是太炎的基本立场。太炎曾言：“六艺，史也”。⁽⁵⁰⁾这种以史解经的进路，注重探求人事、制度等背后的事理，而非单纯以华美辞藻记述往事。借章氏之言，即应坚持以史切要。太炎极为推崇顾炎武、王夫之的论史精神，在他看来，传统经史不仅具有学术史意义，而且当有致用之功。因此，太炎的史学研究，多以政法文教、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为主题，并以史论相结合阐发宏旨。

其次，晚清以降时局世相的影响。晚清之际，史学以外的政治、社会思潮对史学的变化产生了莫大的作用。⁽⁵¹⁾由此，历史与国家、国民等新兴政治概念交织在一起，历史的政治功用得到激发。太炎曾感慨，无史之国，每易沦亡，国家之建立也愈远，而能发扬志趣，保存国性之教育，其要点则重在读史。⁽⁵²⁾基于这一判断，借助历史阐释“社会政法盛衰蕃变”的政治史书写，尤为章太炎所看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的清史研究谱系中，《清建国别记》 also 具有重要意义。试举一例，晚近以来，“新清史”研究颇为流行，它试图赋予满洲以主体地位，进而以此为中心重审东北及亚洲。这一视角忽视了中华帝国的历史疆域及其宪制构成的完整性和一体性，清史学者也纷纷基于不同视角对此予以理论回应。⁽⁵²⁾在此脉络之中，《清建国别记》对满洲源流的梳理考证，对于当下回应“新清史”而言，也具有知识奠基意义。

(二)以历史维系国性

《清建国别记》所论皆是满洲旧事，特定的人物事迹、方域版图，使得满洲呈现为立体的时空结构。在章太炎的论述中，满洲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存在，它与传统禹域构成了时空交错，展现了“同代的非同代性”。正如史家所言：“过去绝不是一件历史学家通过知觉就可以从经验上加以领会的给定事实”。⁽⁵³⁾章太炎对满洲历史的叙述，隐含了其历史判断。这一历史判断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共同促成了章氏关于满洲的历史观。

首先，从时间观来看，清之鼎革再次打破了传统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历史连续性是靠建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来实现的，⁽⁵⁴⁾在章太炎的认知中，这种历史连续性就是以华夏历史为主体的统一叙事。《清建国别记》关于清室肇兴始于“猾夏”的论断，就是这一历史时间观的典型体现。历史连续性的断裂有多种体现，如纪元方式的变化、历史风俗的转变，等等，这些都是章太炎极为看重的。他曾采取多种纪元方式，以构建连续性的历史叙事，例如以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而非光绪二十六年纪 1900 年。通过这些隐微行为，章太炎对清朝予以反思性评述，从而试图弥合历史缝隙。

其次，就空间观来说，清建国是以边缘走向中心的方式渐进完成的，相对于从中心辐射边缘而言，这是一种反向的历史进程。在实然层面上，中国历史内部具有多元时空性，这就要求复数化理解中国历史传统。然而，章太炎所执守的却是由华夏文明主体所主导的历史传统。章太炎所著《中华民国解》的开篇即言：“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⁵⁵⁾在章氏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中，满洲虽是历史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历史意义而言，却是非中心的。无论是辛亥革命之前，还是民国肇造之后，这都是章太炎的一贯认知立场。

至此，从表面来看，《清建国别记》呈现的仍是传统的夷夏观。然而，如果结合时代境况详加分析，便会更深入地理解章太炎撰写此著的历史意识。“历史，绝不仅仅是收集例证，而是通向有关我们自己状况(Zustand)的真正知识(Erkenntnis)的惟一途径，”⁽⁵⁶⁾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上述观点与章太炎的史观较为契合。1923 年，在构思《清建国别记》的同时，章太炎也在主编《华国月刊》。在发刊词中，章太炎曾如此论述时代境况：“挽近世乱已亟，而人心之倣诡，学术之陵替，尤莫甚于今日。”⁽⁵⁷⁾面对风雨飘零的民国时局，章太炎试图借历史拨开混沌万状，走出栖栖遑遑的共和乱象。因此，章氏晚年讲演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历史作为切要之学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和语言、风俗一道，是建国家的条例所系，⁽⁵⁸⁾也是卫国性的核心要素。

借此视角，可对章太炎之论满洲做另一番理解。对于民国时期的章太炎而言，夷夏之辨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非终极关怀。无论是从辛亥之前所作《中华民国解》来看，还是就此后守护共和的具体实践而言，章太炎的思考都已经超越了族群之别，他始终致力于构建共和政体。事实上，章太炎对(过去)满洲的认识，关乎对(当下)民国的理解。从以历史保国性的视角来看，章氏对满洲的历史考证，仍是为了表明历史之于立国的重要性。在此，“历史”具有两种意涵，既指历史材料，又指历史评价。一方面，对清建国的历史梳理，是借助“历史材料”还原了建国的世系渊源和人物事迹。另一方面，对清建国历史的反思性评述，则从反面表明，以边疆群体为“共主”偏离了华夏原初的建国之道，是对共和意象的背反。就此而言，章太炎对清建国历史的研究，并非仅是描述性的历史梳理，而是蕴含规范性的建国理论，即理想的中国应当建立在对共和要义的守护之上，后者

即是关于“国性”的精神表达。就此而言,《清建国别记》是以史切要的典范著作。

需要指出的是,就章太炎的国家观而言,以历史立国是其一贯的学思追求。然而,在共和肇造之后,作为立国之基的“历史”,理应转换为关于共和疆域各区域的“总体历史”。由此,方能借助于申言各区域的历史文化渊源,促进共和政体的内在维系。基于这一认知,在以史切要的立意之下,便可见章太炎以华夏共和历史观为基点评论满洲旧事,略微有些“不合时宜”。原因在于,章太炎作《清建国别记》时,已是民国十三年。此时,历史思考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如何对内凝聚共和疆域,对外守护共和成果。在此书中,虽然章太炎经由对清建国的反思性评述,从侧面彰显了共和政体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在共和政体初创后外患将至的危机时刻(民国十三年),复以满洲作为论题展开历史思考,其历史感召力自有限度。因此,从以史切要的实效性来看,《清建国别记》更应成于辛亥之前,而非作于民国之后。在这个意义上,《清建国别记》可谓是迟来的历史篇章。

结语

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开创者萨维尼曾言:“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他应该是具有批判眼光的研究者,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人,一个长于表达的艺术。”⁽⁵⁹⁾在《清建国别记》中,章太炎充分展现了历史书写者的批判意识与立国理念。尽管此书对清世的考证偶有差池之处,但是通过重构关于清建国的历史解释,却揭示了历史立国的要义和共和政制的规范性原理。整体而言,《清建国别记》具有史学与史论双重意义,前者创立了新的史学体例,后者则蕴含以史切要的立意,呈现的仍是关于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思:以历史维系国性。最后,尤需指出的是,章太炎对清建国的历史批判,并非意在排斥满洲故土,相反,他始终视其为历史中国的固有版图。时值1932年,时局动荡,针对以附庸视东三省的论调,章太炎曾以历史为据加以驳斥:“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⁶⁰⁾由是可知,若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语词概述章太炎的学思,则自有其扞格之处,研究者应当慎思。

注释:

1 章炳麟:《与弟子吴承仕论满洲旧事书》,《华国月刊》1924年第2卷第2期。

2 张钰翰编:《章太炎家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0页。

3 马勇:《〈清建国别记〉整理说明》,《章太炎全集·薈汉微言等》,虞云国等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01页。

4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0页。

5⑥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6、142页。

6 参见袁英光:《章太炎与〈清建国别记〉》,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一辑,齐鲁书社,1980年,第258-282页。

7②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章太炎全集·薈汉微言等》,虞云国等整理,第353、354页。

8 孟森:《清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

9 汪荣祖:《康章合论》,中华书局,2008年,第29页。

10 参见[加]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
- 11 参见《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1页。
- 12②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章太炎全集·葑汉微言等》，虞云国等整理，第355、355页。
- 13 谢国桢：《谢国桢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467页。
- 14[美]爱莲心：《时间、空间与伦理学基础》，高永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 15 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章太炎全集·葑汉微言等》，虞云国等整理，第362页。
- 16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90页。
- 17 参见孟森：《清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1页。
- 18 章炳麟：《与弟子吴承仕论满洲旧事书》，《华国月刊》1924年第2卷第2期。
- 19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2-183页。
- 20 《章太炎全集·书信集》，马勇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5页。
- 21 关于满洲起源诸说，可参见王钟翰：《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 22 赵志强：《满洲族称源自部落名称——基于〈满文原档〉的考察》，《清史研究》2020年第3期。
- 23 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章太炎全集·葑汉微言等》，虞云国等整理，第366页。
- 24 参见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页；孟森：《清朝前纪》，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 25[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3页。
- 26[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黄艳红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xii页。
- 27 参见[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0页。
- 28[德]斯特凡·贝格尔主编：《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孟钟捷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vi页。
- 29 《清实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331页。
- 30 参见萧一山：《清史大纲》，第3-5页。
- 31 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
- 32[清]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孙文良等点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 33 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 34 《满文老档(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392页。
- 35 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章太炎全集·葑汉微言等》，虞云国等整理，第355-356页。
- 36 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41-65页。
- 37 章太炎：《民国光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839页。
- 38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64页。
- 39[清]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孙文良等点校，第29页。
- 40[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页。
- 41 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27页。
- 4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页。
- 43 参见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33页。
- 44 参见[英]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杨贤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1页。
- 45 尤学工、余康：《论章太炎的明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
- 46[德]列奥波德·冯·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 47 参见梁启超：《新史学》，夏晓红等校，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8-89页。
- 48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 49⑥章太炎：《在金陵教育改进社演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章念驰编订，第398、395页。
- 50 章太炎：《清儒》，徐复注：《馥书详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
- 51 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 52 参见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中华书局，2020年。

5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8页。

54[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55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56[美]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84页。

57 章太炎：《华国月刊发刊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79页。

58 参见章太炎：《哀焚书》，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检论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6页。

59[法]安托万·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黄艳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60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章念驰编订，第421页。